# 普鲁塔克的‘史记”

陈述

**陈良**

资深媒体撰稿人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为伟大的史学名著，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罗马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至今仍让西方世界引以自豪。有一部《希腊罗马名人传》（又译《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就是记述古希腊罗马名人的传记作品，就写作风格与影响力而言，可与《史记》相媲美或等量齐观，此书的作者叫做普鲁塔克。

## 生花妙笔写英豪

普鲁塔克（约46年—120年）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出生在希腊中部波奥提亚地区喀罗尼亚城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父亲是敦厚励学的君子，在哲学和神学上都有相当的造诣。他自幼养成对知识的爱好，年轻时进入雅典，受业于名师阿蒙纽斯，孜孜不倦地治学。他一生游历丰富，足迹遍布希腊各地，访问过埃及和小亚细亚，曾因公务去意大利，在罗马待过较长时间，结识不少名人。所到之处，他都极为留心搜集当地史料与传说，从而成为饱学之士。

**无论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在普鲁塔克看来任何伟大时代总与伟大人物密不可分。他之所以为那些英雄豪杰撰写传记，就是让他们以德行与操守所留下的事迹传承下去，并以此为鉴而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

学成之后，普鲁塔克回到家乡，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担任过行政官员，主要工作是调解私人的恩怨，公道审理案件，并为民众提供各种服务。据说，他曾经为两位帝国皇帝图拉真、哈德良讲过课，并博得他们的赏识。进入晚年，哈德良授予他希腊行政长官的高位，还出任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终身祭司，并成为雅典的荣誉市民。他为官清正，平易近人，颇受欢迎，而让他名垂不朽的是他的著述。在履行公职之外，他专心著书立说，写下大量作品，流传至今的有《道德论集》、《希腊罗马英豪列传》（简称《列传》）。

普鲁塔克生活的年代，正值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跨越地中海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他的祖国希腊在经历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已然沦为罗马帝国的臣属与行省。然而，希腊毕竟是希腊，也曾有过无与伦比的辉煌，所创造的高度文明着实令罗马人由衷敬仰。作为希腊民族的优秀分子，普鲁塔克不希望伟大的希腊从此暗淡无光。无论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在他看来任何伟大时代总与伟大人物密不可分。他之所以为那些英雄豪杰撰写传记，就是让他们以德行与操守所留下的事迹传承下去，并以此为鉴而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

与司马迁写作《史记》相似，普鲁塔克对《列传》的结构安排别出心裁。全书写了50位人物，除了4位帝王单独成篇外，其余46篇组合成23对列传。他将希腊罗马英豪中命运、气质或功业相似的人物一一对应分类，分别为之立传，最后进行比较评述，从而构成一篇列传。比如，创基开国者忒休斯与罗慕路斯，政治改革者梭伦与普布利科拉，继往开来者亚历山大与恺撒，政坛雄辩者德谟斯梯尼与西塞罗，彼此相应成传。他的写作手法颇为高超，总能把传主活灵活现地写出来，力争表现出真实的面貌；他没有简单地罗列事迹，而是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甚至包含轶闻逸事和花边八卦；他注重对人物的描绘与情节的交代，讲究意境与韵味，富有广度与深度。

## 流芳千古泽后世

普鲁塔克是一位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哲人，柏拉图的学院派为他打下哲学思维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使他通晓逻辑与自然科学，斯多葛学派让他习得立身处世的原则，伊壁鸠鲁学派让他找到合理的生活方式，毕达哥拉斯学派使他养成与人为善的态度。正是如此深厚的人文修养，塑造了他那悲天悯人的性格与慈悲为怀的情操，所有这些都在其著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所以，他在列传中尽管描述过很多惨烈的战争场面，但并不渲染与赞美暴力；他的笔触饱含着人性的柔情，在写到老加图没有善待奴隶的时候，他禁不住批评其性格苛刻不近人情；他不仅崇尚对人的慈悲，而且将慈悲精神推及到动物，在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的传记中有对于爱护动物的生动叙述，指出人若对他人怀有慈悲之念，对动物也会有恻隐之心。

尽管普鲁塔克钟情于希腊罗马，但它们同样难逃衰亡的命运，所幸的是他的著作并不因时代变迁而淹没。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欧洲进入基督教时代，迎来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柏拉图受到推崇；在中世纪教会时期，亚里士多德成为权威；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当人们开始重视个性与自由的时候，他们开始转向普鲁塔克。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普鲁塔克深刻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他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并且主要的是以间接的路线继续影响着德国的思想一直到今天。”

的确，文艺复兴以后普鲁塔克的《列传》尤为深入人心，不仅对西方价值观的重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灵感与营养。西方史学界对于传记的写作，一直到十八世纪都遵循他的原则与规范，仿照他的风格与样式。莎士比亚从他的作品中获取素材，写出了三部与罗马有关的经典戏剧；蒙田在其名著《随笔集》中，约有四百多处引用他的作品；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把《列传》称为“英雄的圣经”，从中得到很多启迪。时至今日，世界各国仍旧翻译出版名著。盐野七生在写作畅销书《罗马人的故事》的时候，少不了要参阅《列传》。

## 瑕不掩瑜有遗憾

严格地说，《列传》并非完美无缺，其瑕疵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希腊人，普鲁塔克写希腊人物颇为成功，写罗马人物却相对逊色，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他使用母语希腊文写作，而没有运用当时拥有优势的拉丁文，尽管他曾客居罗马相当时日，但他对罗马的了解却不及对希腊那么熟悉，从而使他的妙笔不能完全挥洒自如。从史学角度看，《列传》最为欠缺的是所写的事件都没有指出发生的年月，让读者找不到时间感，这一点大不如《史记》；还有不少轶闻逸事不断出现于《列传》里，虽然增强了戏剧性，使作品更为生动有趣，但未必属实的传说有损于真实性。

还有一大遗憾，就是普鲁塔克有深重的英雄崇拜情结，他所选择的传主大都是叱咤风云的军政领袖，而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精英未能进入他的“法眼”，除了当过执政官的西塞罗之外，他没有为那些文化名人立传。在他看来，就历史价值与不朽名声而言，文化名人无法与建立事功的英雄豪杰媲美。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立功只是其中之一。况且，亚历山大、恺撒、苏拉等人只是称雄一时，他们所建立的霸业并不能持久，不是土崩瓦解，就是烟消云散；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文化名人则永远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他们的思想蕴含着巨大能量，总能给后世带来无穷无尽的想象与影响。

总而言之，瑕不掩瑜，普鲁塔克及其《列传》已赢得历代读者的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仍将散发历久弥新的光彩。

---

# 千古座右铭

读史随札

**马军**

作家

“铭”是我国古代一种固有文体，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记述：“铭者，名也。观器必名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它多刻于庄严神圣或身边的器物上，有的也刻在石上，有的则干脆就是一个器物。它或是对君主美德的赞扬，或是对功臣勋绩的肯定，或是对自己的警戒。如西周吕望的金属铭，晋国魏颗的钟铭；卫国孔悝的《鼎铭》；还有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苏轼的《三槐堂铭》、王安石的《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等。

而座右铭，顾名思义，就是置于座右随时都能看到的铭文。《文选·崔瑗〈座右铭〉》吕延济题注：“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

其始作俑者为东汉人崔瑗。崔瑗（77年—142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善文辞，尤擅长书、记、箴、铭，以文章显名于世，所著《南阳文学官志》最有名。他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知名度很高，被誉为神童。不幸的是老早就失去了父母，哥哥就成了他最亲的人。十八岁的崔瑗来到京师洛阳交游问学，由于他学问好，因此受到众多文人学士的推崇，与发明家张衡和经学大师马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40岁时为郡吏。正当他前程和未来充满无限希望之时，一个意外事件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他的哥哥崔璋，突然被人杀死。崔瑗一时冲动，忘记了走法律这个途径，自己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也给他自己带来了大问题，亡命入狱，吃尽苦头，幸好皇帝大赦天下，才得以释放。

这件事对崔瑗教训极大，他痛定思痛，写下椎心泣血的文字，置之座右，天天默诵，刻刻不疏，警戒自己加强修养，切不可再犯这样的糊涂错误。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座右铭：“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硁硁鄙夫介，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崔瑗提醒自己，不要议论别人的短处，也不要夸说自己的优点。施恩惠给别人，千万不要记在心里；接受别人的恩惠，千万不可忘记。世俗的虚名，不值得羡慕；只有“仁”才是做人的根本法则。做任何事情前，心里觉得安适，觉得不惭愧，然后才去做，别人的毁谤难道能中伤你吗？不要让虚名超过事实，不炫耀才华，不卖弄聪明，这才是圣人所称道的。处在污浊的环境中，贵在不被污浊所染。有才德的人，光芒内敛，只求内在充实，不求表面的虚荣。柔弱的人因为具有韧性，不容易被摧折，所以是适合生存的一类。老子认为刚强容易被折毁，不如柔弱容易生存，因此以刚强为戒。见识浅薄的人，老想表现出刚强的样子。唯有闲静不与人争，他的成功才会不可限量。说话要谨慎，饮食要节制。一个人知道满足而不贪求无餍，就可以制止或避免不吉利的事发生。如果照着这个座右铭，持之以恒地去做，日子久了以后，才德自然会发出光辉来，有如花香的四播。

从这篇《座右铭》看，崔瑗对于世事人情和毁誉穷通，可谓悟透，并且勇于身体力行。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磨砺，他的人生逐渐成熟，学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四十多岁时被任命为汲县（今河南卫辉市）县令，他勤政爱民，带领治下百姓开稻田，修水利，老百姓将他喻为父母，作歌赞道：“上天降神君，锡我慈仁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他还成为“高于文辞，尤善章草”的文学艺术大师，受到尊敬和赞扬。

这篇《座右铭》无疑是成功的，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唐朝的白居易就是他的知音。揣摩之余，白居易又觉得崔铭似有未尽之意，于是再作《续座右铭》：“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自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安足论。无以意傲物，以远辱于人。无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与邪分歧，居与正为邻。於中有取舍，此外无疏亲。修外以及内，静养和与真。养内不遗外,动率义与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不敢规他人，聊自书诸绅。终身且自勖,身殁贻后昆。后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孙。”

白居易谆谆告诫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不要羡慕尊贵与富有，不要忧虑微贱与贫穷。应该问自己道德和修养怎么样，身份的尊贵或贫贱是不值得说的。听到诋毁的话不必过分忧伤，听到赞誉的话不必过分高兴。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怎么样，别人对自己的诋毁或者赞誉不值得理会。不要一意孤行，傲气凌人，这样才能远离他人的羞辱。不要用巧言令色的手段去谋事，以尊重自己的人格。交友时要远离奸邪的人，住所要与正人君子做邻居。在这些方面应该有正邪的取舍，除此之外没有亲疏的分别。修养外在的功夫以达于内在，静养内在使其祥和真诚。修养内在而不遗漏外在，一切按照义与仁去行动。要走千里的路途，也得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高大的山峰是由一粒粒微尘堆聚起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修养也是这样，所贵的是照此行之日日出新。我不敢（用以上的话）规劝别人，姑且把它写在自己的衣带上。终身以此自我勉励，死后赠送给我的后代。我的后代如果谁违反了这些，他就不是我的子孙。

座右铭体现的是作者的品位、修养、境界和追求，悬诸壁间，置一案旁，书于扉页，不亚于一个良师益友在忠诚无比地为自己指路，其意义是不容小视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脚踏实地躬行践履，方不负《座右铭》之美名。

---

# 好运气是干出来的

青史意绪

**刘绪义**

作家

晚清学者朱克敬在《雨窗消意录》中记载，曾国藩曾经和好友吴敏树、郭嵩焘聊天时说：“我身后的碑铭必定会由你们两个人来写。别的话任你们褚饰，但碑铭的结尾语，我亲自写，叫做：‘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说完，相顾大笑。

这固然是曾国藩的戏谑之语，却道出了一个传统士大夫面对大变局回顾自己生平遭遇时总结出的经验之谈，有人以为‘不信书，信运气’六字，教人跌碎眼镜，却是不懂得这正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可宝贵的智慧。

运气不可掌控——多少人对此心有感慨，假如曾国藩也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做事来教子，那么他所写的千万文字都是假话。曾国藩之所以要说‘信运气’，是因为他一生运气好。

一介书生，只考了三次就如愿考中进士，比起左宗棠，运气实在太好；十年京官，从小小翰林做到二品大员，比起有清一代的湖南人，运气没得说；十年戎马生涯，能够干成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运气当然好；始终得到朝廷信任，死后身获殊荣，流芳百世，运气太好了。

可是，他的好运气是怎么来的呢？

边干边学——曾国藩是个文官、京官，没有军旅经历，也没有进过军校。但是，他没有借口专业不对路，也没有要求先培训，就接受了朝廷的任务，组建起一支军队，最终凭着这支队伍打败了敌人。这期间，他是边干边学。向历史学，学到了戚继光的治兵之法；向身边人学，得到了诸如左宗棠等能人的指点，悟出了李续宾带兵的“浑”字诀，尽管曾经屡战屡败，但实践出真知，时间一长运气就好了。

边干边筹——曾国藩组建湘军时，朝廷没有经费，士兵吃饭、发饷，购买武器，钱从哪里来？只能自己想办法。他没有退缩，军费边干边筹；打出几个胜仗，让朝廷觉得可以依靠，然后争取各地支持。即便不能按时发出饷钱，他也能想办法做通湘军的思想工作，使湘军保持战斗力，运气就来了。

边干边等——曾国藩出山时只是一个在籍侍郎，没有实职。征兵筹饷、提拔将领，没有权力，办事极难，人心不附。但他没有犹豫，而是边干边等。慢慢地，他做出了成绩，但他不争名不争利，以大局为重，在隐忍中崛起。这一等就是七年，最终，等来的是朝廷的信赖与支持。

边干边聚——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孤家寡人一个，兵谁来带？事谁来干？他深知“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但他没有等待，人才边干边聚。先是找自己熟悉的朋友，做他们的工作；后来只要听说谁有才，要么写信并附路费邀请他加盟，要么找机会登门拜访，要么请朋友推荐，总之是费尽心机。刚开始两三个，慢慢地十几个、几十个。一边等待人才进来，一边自己着手培养。多少白面书生、农家少年，在他的训练培养下脱颖而出，从中下层军官一跃成长为高级将领。干事创业就得有人气，人气旺了，运气就好了。

有道是，运气来了，连门板都挡不住。

曾国藩多次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躬身入局，挺膺负责，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另一种表达。当官从政，固然需要用手中的权力来调控，更需要以自己的言行来垂范。因此，曾国藩借用了孔门四科的说法：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作为对当官者自身的要求。而对于这四科，曾国藩用“磨砺”二字概括。运气绝不会青睐蠢、笨、懒者，曾国藩一生勤学、勤政、勤悟，自省、自概、自修，但他知道，这些道德修养，只有落实到实践中去磨砺，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能从洋人精良的技术那里悟出一个哲理：

“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尔精曜夺目。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同样是铜铁树木，为什么洋人做成的东西就光彩夺目，精巧耐用？不外“磨砺”或“琢磨”二字。人也一样，只要肯磨砺自己，舍得吃苦，舍得用功，一样能把自己磨砺发光。遇事做老爷，工作图轻松，生活图舒适，再好的人才都会变成铁锈朽木，再好的机会都会白白流失。曾国藩将实践中的磨砺，看成是把握成功机会的基石，继而化作了强大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内在的千钧之力，让自己一步步迈向成功。

一句话，好运气是干出来的。悟出了这一点，才算悟出了曾国藩智慧的真谛，才能化作行动。

---

# 薛胄识假

丹青引

**王丹誉**

出版人

漫画家吴军绘图

隋文帝开皇初年，陈州有个叫向道力的人，用冒名顶替的作假手段获得高平郡太守的朝廷委任状。这位假太守在赴任的路上，不巧被兖州刺史薛胄碰见。薛胄观察发现，这位赴任“太守”行迹有些异常，想要扣留盘查。他的副手（官职司马）王君馥劝他别管闲事，于是薛胄只好放行。转念一想，薛胄又后悔不该放过此人，立即派出自己手下的主簿快马追赶，并拘禁了这位伪太守向道力。正巧薛胄有位部下叫徐俱罗，对司马王君馥讲述自己的遭遇：“向道力冒充顶替我已经当上太守这么久，刺史薛大人怎么还能怀疑他的假冒行径呢？”原来，徐俱罗曾被朝廷任命为海陵郡守，而在他上任之前此职却早已被这位向道力冒名顶替，至今任期已满，官府和百姓竟没有察觉。王君馥就把徐俱罗的原话转告薛胄，又一再苦苦哀求，请薛胄不要再管这种闲事。刚正不阿的薛胄闻此，怒气冲天，呵斥王君馥：“我已经发觉并且掌握此人假冒他人之名而骗得朝廷官职的重大案情，作为刺史副职的司马，你敢包庇案犯，按照朝廷法律你也应当连坐受刑！”（司马容奸，当连其坐！）王君馥被训斥得哑口无言，只好前往逮捕向道力。向道力归案自知罪责难逃，就招供了自己冒名顶替骗取官职之罪。

薛胄甄别案犯，果断将其缉拿归案，并使之主动认罪甘愿受刑。他所查办的案件都像这样，敢于将不法之徒当众揭穿并且当场拿下。

这位薛胄是何许人也？他字绍玄，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是北周至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出身名门世家，父亲薛端，曾任北周的蔡州刺史。薛胄小时候聪明好学，每次阅读新奇的书籍，都能通晓其中深意。他经常感叹某些书籍的编辑、考证和注释者本身就没有领会古代圣贤的深刻思想，动不动就只是用字面意思随意下结论。当时的读书人，都赞美薛胄治学严谨。他性格热情豪爽，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将来要为国家建功立业。

在北周明帝（宇文毓，557年至561年在位）时，他袭承了父亲文城郡公的爵位，一步步地升迁到了上仪同的职位（魏晋之后，将军开府置官属者称开府仪同三司），不久晋升为司金大夫（主管全国矿冶和货币铸造的最高长官），后来又加授开府（享受三公待遇）。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登基后，他被提拔为鲁州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任命为检校庐州总管事；不久，又被任命为兖州刺史。上任时，他看到关押数百名犯人的监狱人满为患，于是用十天时间就审结了历年积压的全部案件，监狱顿时为之一空。正因为他处理事情多怀平正宽恕之心，而不是一味刻酷严厉，因此有“平恕”之名。

早先，薛胄在兖州任职时，很注重兴修水利。兖州地势较平坦，有沂、泗两条河流在州城之东汇合，向南流去，竟然出现大面积泛滥区。薛胄到任前，这里经常发生水灾。他下车伊始，就亲自到现场实地勘察地形和水势，开始垒石为堤堰，使原本向南流的河水改道向西流，这样使原来大片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变成良田。薛胄又开通了当地水陆交通，畅通了淮河到东海地区的交通和贸易，深得百姓信赖爱戴。为了纪念薛胄的恩德，兖州百姓将沟通淮河至东海的运河称为“薛公丰兖渠”（薛胄让兖州百姓得到恩惠所修的河道）。

后来，他又出任郢州刺史，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俱有惠政”。此后，又任卫尉卿、大理卿。他执法公正严明，对百姓特别宽厚，因此享有“称职”的美誉。